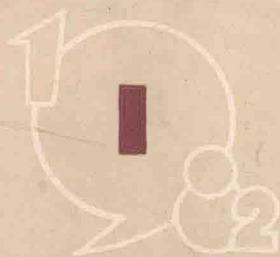


東歐

-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季米特洛夫
 - 波兰事件的经济根源
 - 匈牙利——改革之路
 - 马泰休斯的语言理论（上）
 - 波兰现代小说创作（上）
 - 讽刺文学大师杨·鲁喀·卡拉迦列
 -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片段）
-

Dongou



東歐丛刊

(第一輯)

北京外国语学院

《东欧》丛刊编辑部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东欧丛刊（第一輯）
北京外国语学院
《东欧》丛刊编辑部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排版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16 5 印张100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7215·1 定价：0.40 元



编 者 的 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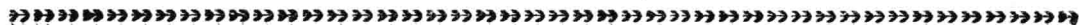
《东欧》丛刊与读者见面了。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办成一个研究和介绍东欧情况、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刊物。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人们的目光不仅注视着国内，同时也投向迅速变化着的世界。

东欧是在世界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的。东欧诸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口，拥有自己发达的文化。他们几十年来经历过的道路和目前的状况，那里发生的重大事件，那里的文化，都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了解研究。所以，本刊的内容将包括介绍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情况，还准备译介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既着重研究东欧的现状，同时也不忽视它的历史；发表的文章，有的是研究性质的，有的是情况的报道、综述，或国外人士的文章的移译。总之，内容和文字力求广泛多样，使本刊不仅是一个研究东欧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开拓视野和增益知识的刊物。

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 and 研究问题，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刊物来增进我国人民对东欧的了解，促进我国对东欧的学术性研究。

中国人民已经从“十年内乱”的噩梦中觉醒。他前进中的坚定脚步声震动着东方大地。他要将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作为起点，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我们的力量微薄，但是愿热忱地将这份力量贡献给这伟大的新的时代。



東歐丛刊

(第一辑)

Dongou

目 录

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季米特洛夫——纪念季米特洛夫诞生一百周年……杨燕杰 (1)

东 欧 经 济

波兰事件的经济根源……陈远志 (8)

匈牙利——改革之路……〔波〕耶日·鲁贝尔特·诺瓦克 (18)

匈牙利农业中的工业化生产体系……罗素冬 (23)

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马泰休斯的语言理论 (上) ……朱伟华 (25)

文 学 评 论

波兰现代小说创作 (上) ……易丽君 (31)

罗马尼亚十九世纪讽刺文学大师杨·鲁喀·卡拉迦列……冯志臣 (44)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 (片段) ……〔捷〕古丝塔·伏契科娃 (54)

捷克文化艺术的一颗灿烂明珠——纪念布拉格民族剧院落成一百周年…徐 哲 (66)

触动 (小说) ……〔捷〕艾杜阿尔·贝蒂什卡 (68)

出 版 消 息

保加利亚新版《季米特洛夫全集》开始出版……苏 欣 (75)

封面设计……张杰栋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季米特洛夫

——纪念季米特洛夫诞生一百周年

杨 燕 杰

今年六月十八日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保加利亚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诞生一百周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各国的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都深切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中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

早在一九三四年中国红军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希望开始进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就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在题为《我们决不把青年交给法西斯》的演讲中热情地宣称：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行列里，象西班牙和中国的共青团这样的战士已经成长起来了。”¹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三年，季米特洛夫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他在这段时期内，深入研究了各国共产党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争的战略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各国的进步报刊上，季米特洛夫一直谆谆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起来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主义，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分子和美、英、法反动势力共同准备的战争，他号召他们团结在各国共产党的周围，堵住法西斯匪徒们的罪恶道路，保卫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派兵侵入华北，威胁平津。整个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经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签名公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热情地赞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庄严宣布：

“……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倡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

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相信：由我来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一切苏维埃，向中国革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那确是可以表示我们大会全体代表的情感和思想的。我们向身经百战的英勇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而且我们敢对中国人民保证，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²

此后，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曾多次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从各方面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季米特洛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专文中，着重指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重大国际意义，并号召国际无产阶级给予援助，他写道：

“全世界无产阶级非常注意中国事变。他们再三地表示对于奋斗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但是，当中国直接受到完全殖民地化危险的时候，这样一般地表示同情是不够的。必须对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予以亲热的爱护和真正精神上、政治上的拥护……”

“希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纪念，成为动员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去帮助中国人民的大推动力，这个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与反战争战线的的一个最严重的阵地上进行为自己民族独立生存的斗争。”³

季米特洛夫在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如《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乃是目前时局的最使命》、《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国际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斗争》、《战争与各资本主义国度里的工人阶级》、《五一节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等中，都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并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国际无产阶级支援中国人民。一九三六年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一宣言》也庄严地号召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同志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执行的新政策，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复杂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这是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的高度评价。这些意见对巩固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政治局的路线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人民的胜利，他们要统治全中国，猖狂发动内战。中国人民被迫又拿起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季米特洛夫这时已经回到解放了的祖国，领导勤劳勇敢的保加利亚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怀着满腔热情欢呼中国人民即将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中国人民，为了取得自己的独

立，正在从事顽强的、英勇的长期斗争，以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反动腐朽的代理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而英明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获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打垮了有美帝国主义予以武器及其他接济的中国反动势力的雇佣兵；现在，这一支百万大军已经解放了整个东北、几乎整个华北和内蒙，而正在向蒋介石的首都南京挺进中。在总数达到五万万的中国人民中间，民主势力已经压倒了反动势力，他们的最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⁴他的这一段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所打断，接着，代表们全体起立，有节奏地高呼“毛泽东，毛泽东”。这一热烈的场面充分表达了在季米特洛夫教导下的保加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富有远见的导师

季米特洛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理论家。他经常号召人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南，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在给《哲学思想》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说：“实践和理论的完全结合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而没有实践的理论是无用的。这对肩负着不仅正确地 and 科学地解释现实，而且还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人民的利益而根本改变这个现实的任务的工人阶级说来，是特别正确的。”⁵他热烈地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他说，共产党人认定国际主义是各国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斗争的保证。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人民民主的新保加利亚的建设问题等等的言论中，季米特洛夫都创造性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辩证地对待现实的典范。他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改善党的宣传工作和培养造就大批干部等方面的光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巨大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⁶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的专文。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论断，对认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中，列举了意大利、日本对阿比西尼亚、西班牙、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程，他指出：“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⁷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论断，大大地帮助了世界人民，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识破法西斯主义玩弄的种种假和平花招，有力地动员人民下定决心，团结起来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去争取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最后胜利。

季米特洛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专文中，在论述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道路上还会遇到内部的困难。它要克服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这些分子不懂得在现实条件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同样要反抗机会主义投降派，这些分子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把他们与其他的组织和其他的军队混合。中国共产党将光荣地、忠实地执行一切抗日协定的义务，可是它不愿意盲目地相信同盟军和不愿意走上投降的道

路。”⁸季米特洛夫的这一精辟论述和文章中的其他结论，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建立这一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同“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十分生动地阐明改进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之后指出：“当你写东西做演说的时候，无论何时总要注意使每个普通工人，都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应当时刻注意：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说话。”⁹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的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讲演里就亲自推荐季米特洛夫关于宣传工作的讲话，他还说：“……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医治好才行……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¹⁰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正式规定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结束语》中关于宣传的群众化的论述为学习文件。

季米特洛夫在上述的《结束语》中，对干部问题也作了极其重要的论述。他指出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熟悉自己的人材，正确提拔干部，善于使用干部，正确分配干部，有系统地帮助干部和注意保存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展和利用现有的干部力量，并且从群众运动这个取之不尽的干部源泉里面，源源不断地汲取新兴的和优秀的积极分子”。¹¹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发出的《中央宣传部通知》，又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段讲话连同关于干部标准的论述定为学习文件。毛泽东同志后来又把季米特洛夫关于干部标准的论述归纳为简明扼要的四句话，他说：“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¹²上述季米特洛夫的两个讲话均编入有名的《整风文献》中，受到当时参加延安整风的干部的异常注意，并且成为以后全体党员干部经常学习的材料。

伟大的榜样

季米特洛夫的一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是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的崇高榜样。

季米特洛夫在一九〇二年讨论他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的会议上就说过：“我之所以希望做个党员，是因为我深信工人阶级不能靠阶级调和的办法，而只有靠革命的办法才能从剥削中解放出来。”¹³此后，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以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紧密派”社会主义者一边，积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六年，保加利亚法西斯统治者两次缺席判决季米特洛夫死刑，可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勇气。一九三三年，季米特洛夫在柏林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制造了莱比锡审判案，诬告季米特洛夫是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罪犯，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但是，事件的进程正同法西斯分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在死亡面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把法西斯法庭

变成了世界讲坛。他不仅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象，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广大群众阐明了共产党的原则、纲领和策略，为共产主义进行了极其生动的宣传，同时还指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巨大危险性。季米特洛夫在这里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光辉榜样，捍卫了祖国人民的荣誉和共产党人的尊严。他在法庭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自豪地宣称：“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是的，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我是一个负责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我对我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文件和行动负完全责任。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纵火犯。”¹⁴

三个月以后，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次发言中，义正词严地宣布：

“不仅我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忍残的’、‘野蛮的’。我被叫作‘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这类事情不能沉默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幸福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和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您，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不是残忍的和野蛮的呢？

.....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自豪。”¹⁵

季米特洛夫在这篇铿锵有力的发言的结尾说：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定他是一个异教徒，要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喊道：‘地球仍然在转动！’这个科学的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推动的这个车轮，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¹⁶

这场经过了五十七次庭审，连同预审共历时十个月的审讯，本来是法西斯分子想用对付共产主义的，结果却变成了对刚刚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的第一次打击。世界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起来保卫季米特洛夫，组织了抗议莱比锡审判运动的大

规模示威游行。于是，审判又起到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巨大作用。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气吞山河的发言，已经成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不朽文献。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品格，汲取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它鼓舞了全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一代代革命者为美好的未来同敌人英勇斗争。多少囚禁在敌人监狱里的革命战士曾经以季米特洛夫为榜样，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忠贞！

深厚的友谊

季米特洛夫热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他曾深情地对中国同志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很多久经锻炼的有学问的同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懂得中国人民的要求，是那样的和人民结合着，这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十分对的、各国的人民要向他学习！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对少数反动派，这个办法是非常正确的。”¹⁷

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生活、敌人监狱的残酷折磨，严重地损害了季米特洛夫的健康。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季米特洛夫在长期重病之后与世长辞了，年仅六十七岁。他未能在生前亲眼见到他如此关怀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十分遗憾的，但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季米特洛夫逝世时发出的唁电中称季米特洛夫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对季米特洛夫战斗的一生的最中肯的总结。

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就出版了季米特洛夫的著作，如《为和平而奋斗的统一战线》、《大家急需认识的法西斯蒂》（即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等书。他的第一部译成中文的选集《季米特洛夫选》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出版的。全国解放后，又陆续出版过两种选集。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他的狱中书信和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论述。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出版了十多种他的著作，四种传记，散见在各种报刊上的关于季米特洛夫的文章就更多了。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人民是多么尊敬和怀念季米特洛夫同志。

今天，当季米特洛夫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将重温他的不朽著述，缅怀他的伟大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从中汲取巨大的力量，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注 释

1. 《季米特洛夫全集》，保文版第9卷，第494页。
2. 《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103页。
3. 《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44—245页。

4. 《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4—275页。
5. 《论〈哲学思想〉杂志的作用和任务》。《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与科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6. 同注2，第45页。
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464页。
8. 同注3，第243—244页。
9. 《为工人阶级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季米特洛夫文集》，
解放社1950年版，第187页。
10. 同注7，第844页。
11. 同注9，第189—191页。
12.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901
页。
13. 《季米特洛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4. 《在莱比锡法庭上第一次发言的提纲》。《季米特洛夫全集》，保文版第
9卷，第115页。
15.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的最后发言》。《控诉法西斯》，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2—23页。
16. 同注15，第48页。
17. 《我会见了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三联
书店1950年第2版，第152页。

波兰事件的经济根源

陈 远 志

1980年夏季，在波兰爆发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发生，既有它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本文就这次危机的经济原因，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波兰曾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第二次大战中，它遭受了人力和财力的极大破坏，有600万人死亡，残废者近60万人，固定资产损失了38%，战争造成的损失高达169亿美元。

战争结束后，在波兰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波兰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高度的劳动热情，迅速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1949年，波兰三年恢复计划完成时，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战前1938年的25%，接着，1950—1955年的六年计划完成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1978年，波兰的国民收入比1947年增长了11倍，工业生产增长了22倍。¹这一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如下：煤1.92亿吨，钢1,930万吨，电力1,156亿度，小轿车34万辆，载重汽车6.51万辆，远洋船舶39艘计60万吨（1975年为83艘计102万吨），粮食2,150万吨，肉类326.4万吨。²这些数字说明，波兰已从战前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工业国家，它同高度发达的工业国之间的距离已大为缩小了。

在战后的三十多年中，波兰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仅以高等教育事业为例，1978年波兰有89所高等院校，大学生48万人，大学教师4.9万人。平均每1万居民中有138名大学生，这个比例高于西德（136人）、英国（114人）、捷克（112人）和匈牙利（104人）的水平。³

毋庸置疑，波兰在战后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波兰人民在战后初期恢复家园、重建首都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举世闻名的“华沙速度”，都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波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便出现一些问题，诸如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相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与农业之间比例失调；工业发展中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失调等等。长期以来，这些方面的比例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

在1950—1955年的六年计划期间，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农业和轻纺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因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终于在1956年的6月爆发了“波兹南事件”（直接起因是波兹南市泽格尔斯五金工厂工人反对提高劳动定额）和同年的“十月事件”，最后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改组，由哥穆尔卡接替奥哈布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哥穆尔卡当政的最初三年，对经济作了些调整，降低了积累和投资的比例，扩大了对消费资料工业和农业的投资，经济情况因而有所好转。但是，在1959—1968年期间，又提高了积累的比例和扩大了对第一部类的投资，从而影响了群众生活的改善。1970年12月，当波兰政府作出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时，就引起工人的反对，造成格但斯克沿海地区工人的流血事件。

盖莱克当政后，于1971年3月撤销了1970年12月作出的提价决定，食品价格恢复到12月以前的水平。1971年波兰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整个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出了一条依靠外资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由于大举外债，猛然扩大对第一部类生产的投资，就破坏了积累与消费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从1976年起，经济困难开始出现。当局为了减少国家对肉类等食品的收购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收购价高于零售价），以及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状态，于1976年6月作出提高食品零售价格的决定。但是，立即遭到拉多姆等地工人的强烈反对，当局被迫在24小时内撤销了提价决定。但此后并未采取果断措施来调整经济，结果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1979年，波兰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国民收入在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下降现象。到了1980年，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国民收入下降4%，市场供应更趋紧张，肉类、食品、日用消费品等十分匮乏，通货膨胀加剧。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危机。

进入1981年以后，波兰的经济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危机进一步加深。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1982年1月29日发表的《关于1981年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公报》，这一年的国民收入下降了约13%，工业生产下降约19%。在农业方面，因风调雨顺，总产量增加了3%左右。然而，由于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锐减，城乡交流基本瘫痪，通货膨胀持续发展，使农民对兹罗提（波兰货币名）失去了信任。尽管收购价格有所提高，农产品还是收购不上来。因此，城市肉类食品等供应奇缺，商店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空如也。而一旦来货，便立即抢购一空。于是，黑市交易、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危机使人们陷入了苦海之中。

二

为什么三十多年来波兰的经济取得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之后，竟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危机呢？根据一些材料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择要谈几个问题。

（一）大举借贷，超出国力

1970年12月盖莱克担任第一书记后，制定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第二个波兰”、“人人有住宅”、“家家有汽车”等口号。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作出了积极利用西方贷款的决策，即依靠西方贷款大量引进新技术和机器设备，建立新的工业项

目，然后用这些新建工厂生产的产品，一部分向西方国家出口，以换取外汇还本付息，另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由于新建许多工厂，还可以解决因七十年代上半期人口高峰而出现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波兰开始到处借债。据统计，1973年波兰欠西方国家的债务为25亿美元，1976年猛增到110亿美元，到危机爆发的1980年年终则高达235亿美元。⁴据西方报刊透露，到1981年年底波兰欠西方国家的债务约达260亿美元。在1970—1980年的十年中，波兰外债累计为420亿美元。⁵

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在一年内的外债还本付息总额，一般不应超过其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汇的20—25%，如超过这个比例，则认为该国的清偿能力偏低，债务信用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波兰早在1975年就超过了25%的界限，到了1978年甚至将出口收入（硬通货）的50%以上都用在还本付息上了。然而，更加作难的是，波兰负债过多问题还不能及时纠正和刹车，因为要使引进的工厂继续运转或使引进的工程项目进行下去，还是得从西方进口一定的原材料、设备和零件，而这些商品只能用硬通货购买。但是，波兰同西方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使其无力支付从西方的进口，更谈不上清偿债务了。

七十年代以前，波兰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用农产品换取机器设备，贸易比重不大，进出口基本平衡。1971年以后，因波兰从西方大量贷款，扩大进口，大办工厂，于是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急剧增长。1970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在波兰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由33.77%猛增到1974年的50.55%，1975—1979年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2—48%之间。可是，由于进口大大超过出口，从1972年起，在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便开始出现逆差（达10.7亿外汇兹罗提）。其后几年外贸逆差激增，1973年为42.21亿外汇兹罗提，1974年为71.26亿，1975年为88.75亿，1976年为97.36亿。出现巨额逆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以及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使波兰从西方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粮食的价格猛涨（高于波兰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另一方面是许多西方国家在进口方面采取保护性措施，波兰出口商品由于质量差、竞争能力低，就难于打入西方市场。此外，七十年代下半期，波兰拖欠西方外债的清偿期已经到来，而出口收入的外汇需要用来还本付息。1980年，波兰仅支付西方债务的利息就要25亿美元以上，到1983年将达40亿美元之巨，这样，就缺少足够的外汇进口必要的原材料以维持出口生产。而出口生产下降又直接影响外汇收入和清偿债务的能力，因此不得不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以维持经济的运转。据估计，到1985年，波兰拖欠西方的债务将达350—360亿美元。⁶可见，波兰外债包袱越背越重，在外债的恶性循环之中越陷越深。

（二）盲目投资，效益很低

1. 投资项目过多过大，周期长，见效慢

从1971年起，波兰经济中的投资比例突然提高，投资额逐年增加。据统计，投资额由1970年的2,071亿兹罗提增加到1978年的6,757亿兹罗提，1979年略有下降，为6,309亿兹罗提，即在十年中增长了两倍多。在投资项目中求大求新，大型项目占了60%

以上，它们都是耗资多、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另一方面因投资迅速增加，各主管部门、各地区、各联合公司都争投资，争基建项目。于是各种项目蜂拥而上，许多不该建的项目也盲目上马，结果基建摊子越铺越大，战线越拉越长。

由于在短时期内投资项目骤然增多，投资速度加快，势必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失去平衡。电力、原材料等短缺，致使投产项目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完全不被利用，这就造成大量的资金积压，迟迟不能发挥效用。据估计，正在进行的基建工程和已投产的投资项目上积压的资金，1970年为1,290亿兹罗提，1979年高达6,650亿兹罗提，⁷相当于1979年波兰国民收入17,014.27亿兹罗提的39%。如此巨额的资金不能发挥效用，必然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

2. 投资方向错误，不能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

在使用外国贷款方面，如何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和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外资能否发挥效用的重大问题。

波兰是东欧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它拥有硬煤的蕴藏量达800亿吨，仅次于苏联、英国，居欧洲第三位；硫磺矿的储藏量居欧洲首位；石盐的储藏量为60亿吨，不仅可以满足本国需要，而且有剩余可供出口。像这些矿产都是发展化学工业的很好原料，而波兰的化学工业又是相对薄弱的一个部门，它既不能为农业提供足够的化肥、农药，也不能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日用化工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扩大对农业的投资，以提高农业产量并减少粮食进口。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已指出：“应该认真考虑，目前片面地强调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是否真正完全地适合我国的经济地理条件和现代化技术发展的要求问题。我认为需要把投资转向化学合成（尤其是新的物质合成）工业，因为我们具备硬煤这个特别有利的原料基地。”⁸ 1971年11月波兰议会开会讨论1971—1975年五年计划草案时，辞职不久的哥穆尔卡以议员的身分致函波兰统一工人党议会党团主席，信中他根据多年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建议少借外债和大力发展化学工业以及扩建纺织工业。⁹ 然而，当时的领导人选择的投资目标既不是化学工业，也不是农业和基础结构，而是钢铁、五金、电机、机械工业。这些部门都是电力、原材料消耗最大的部门。而且从西方引进的新工厂，由于技术工艺方面的要求，只能用从西方进口的原材料。结果，七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方贷款花在进口原材料上。据估计，在七十年代从西方的贷款中，只有20%用于购买机器设备，而65%用于进口原材料，15%用于购买粮食和饲料。¹⁰ 当七十年代后期因经济发生困难，外汇拮据时，波兰不得不大量削减从西方的原材料进口。于是一部分新建工厂被迫停产，而与其协作的企业单位也相继发生了连锁反应，这不仅使投资效用不得发挥，而且整个国民经济也被打乱了。

（三） 积累率高，失去平衡

七十年代前半期，由于尚有过去留下的老底子，加上利用西方贷款，解决了原材料和粮食的进口问题，工业生产迅速上升，同时，1971—1973年农业也获得了好收成，因

此，这个时期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高达9.8%。但是应该看到，这期间突然提高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积累率，造成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如前所述，1959—1968年期间，积累率有过偏高的情况，后来作了调整，降低了积累率。1970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只占25.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还是比较适中的。可是，1971年猛然把积累率提高到29.4%，接着，1972年为31.7%，1973年为34.8%，1974年竟高达36%。¹¹ 如果考虑到基建资料的价格低于消费资料的价格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积累率还要高出许多。根据经济学家米奇斯瓦夫·米耶什昌科夫斯基的计算，1974年和1975年的积累率为38%，毛积累率是42%，加上价格因素则接近50%。¹² 这样便使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去平衡，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继续提高。

与此同时，在七十年代上半期积累和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急剧升高了（见表1）。

表1 1968—1978年国民收入分配动态

项 目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78
消 费	5.0	5.5	8.7	5.7
积 累	8.4	6.6	19.0	-1.1
其中： 物质生产领 域的净投资	12.4	10.0	24.8	-2.9

资料来源：瓦迪斯瓦夫·什蒂贝尔《1960—1978年波兰市场平衡对比关系的变化》载波兰《经济学家》双月刊1981年第3—4期第708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积累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由1966—1970年的6.6%猛增到1971—1975年的19%，接着，在七十年代的下半期又急剧下降到-1.1%。投资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积累和投资增长率的大起大落，必然在基建战线上造成严重后果。因为短期内骤然增加投资，就会使原材料、设备等供应和施工力量都无法跟上基建的发展，而积累和投资的突然减少又会使已动工兴建的项目难于继续进行，一些按计划必须兴建的配套工程项目也无法上马，这样就必然拖长整个建设周期和积压资金。应该指出，七十年代积累的主要部分是用于第一部类生产的投资，这就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和平衡，导致了七十年代后半期国民收入和工农业生产的下降（见表2）。

表2 主要经济指标动态

（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用%表示）